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①

[德]马克思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

科隆 12 月 31 日。德国报刊在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各省被查禁这一事实，正颇为令人信服地打破轻信者对将来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沾沾自喜的幻想。既然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而被查禁的，那么与此同时，希望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国内问题的想法也就一并遭到了禁止。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实际结论。

对《莱比锡总汇报》提出的主要责难大致如下：

该报接连不断地登载传闻，这些传闻后来至少有一半被证明是谣言。此外，该报不是立足于事实，而是紧盯着动机；尽管该报在这方面的见解常常是错误的，但它总是以不容争议的庄重语调，而且往往带着充满敌意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该报的行为是反复无常的、‘轻率的’‘不老成的’，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初创时的做法都同德国报刊一样，而且所有这些报刊当然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责难。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因此，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 版，351～35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表现出真正“朴实的”政治态度,在一般情况下,连报刊的敌人对这种政治态度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对年轻“报刊”纷纷提出的责难是相互排斥的。有人说,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多么坚定、稳妥和明确。这些报纸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因此,人们忽而责备报刊要对没有政党负责,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并创立政党。可是事情很明显,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准确性不像对这一事件赖以产生影响的道德实质那样关心;不管人们认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事件的道德实质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是一种真实的童话。其次,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即使年轻的报刊每天都使自己遭到非议,即使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来了解自己的状况,并且知道,报刊中尽管存在着种种由于怀有敌意或缺乏理智而产生的毒素,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药剂。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承担着各种罪过,并为它忍受着屈辱;为了它的荣誉,它的报刊正在抛弃高傲、自负和刚愎自用的作风,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棵道德精神的玫瑰。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作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因为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不祥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斗争都是这一存在得到认可和这一存在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不仅使政府,而且使人民、使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这种权利究竟是一种让步还是一种必然,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

写于 1842 年 12 月 31 日

载于 1843 年 1 月 1 日《莱茵报》第 1 号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①

科隆1月3日。《科隆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上,查禁这家报纸的内阁指令所署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这个谜容易解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而《科隆日报》认为不但可以编造出一篇通讯,而且还可以编造出一名通讯记者,并且硬把它自己的声音说成是从可爱的莱比锡市发出的。《科隆日报》的“商人式的”幻想是如此“精明圆滑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隆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报馆不可能设在科隆。如果《科隆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地考虑之后,还妄图为自己的幻想把戏辩护,说它是确凿的真情实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还打算容许报刊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代表德国所有的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首先各自形成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

写于1843年1月3日

载于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396~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好报刊和坏报刊^①

科隆 1 月 5 日。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过一些抽象的言论。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吧!

1 月 5 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在一篇注明写于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章中以“好报刊”自诩。1 月 5 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同时又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

柏林 12 月 31 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

相反,《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同《莱茵报》一致,它报道说:

柏林 1 月 1 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

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科隆日报》的声明不能使我们满意。它“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语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对此我们曾发表评论,而它在对我们这篇评论的答复中却只谈有关日期的问题,甚至只谈一处刊误的问题。《科隆日报》自己想必也明白,在“这个谜容易解开,只要说明下列情况就够了:《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消息是 12 月 31 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段话中,有关的日期应该是“12 月 30 日”,只是由于刊误才出现文中的那个日期。《莱茵报》,还有《科隆日报》正是在 12 月 30 日中午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必要时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

写于 1843 年 1 月 5 日

载于 1843 年 1 月 6 日《莱茵报》第 6 号

【导读】 要做人民的报刊

报刊的使命是什么?报刊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报刊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一系列关乎报刊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回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 版,398~39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告诉我们：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人民看到自己精神的本质在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

1842年12月，《莱比锡总汇报》由于刊登了批评普鲁士国王的一封信而被查禁，为此，马克思撰写了一组文章来斥责专制政府。在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

要做人民的报刊，就要如实地反映人民的所思所想，把人民的希望与忧患公开报道出来；要做人民的报刊，就要代表人民利益与一切丑恶、不公正做斗争，不怕污辱与牺牲；要做人民的报刊，就要保持真实的纯洁的本质，始终坚持真理反对谬误。

针对政府指责人民报刊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很坦率地承认“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他再一次强调了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全部报刊是一个完整的机体。他指出，一个《莱比锡总汇报》并不是整个德国的人民报刊，事实上，“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

“好报刊”是根据事实来说某些事实，而不是根据希望来说某些事实；是表达社会舆论，而不是歪曲社会舆论；是传递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压制人们的声音。

归根到底，只有人民的报刊才是真正的“好报刊”。